

9·11之后欧洲移民政策的若干思考

李明欢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厦门 福建 361005)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社会, 曾经在欧洲生活过比较长的一段时期, 做过一些实地调研。1999年底, 我结束了在欧洲的“游学”生活, 回到国内, 到厦门大学工作。今年夏天, 我应法国科学院的邀请, 到巴黎担任客座研究三个月。虽然离开欧洲不过两年多的时间, 却感到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 欧洲华人社会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变化。我跟我的同事开玩笑说: “重返欧洲, 真有‘山中数日, 世上千年’之感!” 这些变化自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中,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影响不容低估。在欧洲三个月的调研, 以及与当地学者的探讨切磋, 使我深深地感到, 9·11事件并没有过去, 它在西方国家民众内心深处刻下的烙印, 以及它对社会政策产生的深刻影响耐人寻味, 其潜在影响值得追踪。

我想谈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在巴黎时, 正巧赶上法国的国庆节。法国国庆每年都要在巴黎最著名的香舍丽榭大道举行阅兵仪式, 我自然不能失去这一难得的机会。7月14日一大早, 我就乘车赶往市中心。阅兵开始了。一辆辆坦克车、装甲车, 还有种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新式战车, 排成一个个方阵, 威武地从位于香舍丽榭大道西端的凯旋门出发, 缓缓向东驶来。人群静极了, 只有战车隆隆行进的马达声。我站在人群后面, 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还是香舍丽榭大道吗?! 平日的香舍丽榭大道, 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店, 最高级的消费场所, 号称是世界上最繁华、最美丽的大道! 但此时此刻, 这里却行进着最新式的战车, 展示着足以毁灭一切繁荣的武器, 往日那种奢华, 那种喧闹, 此刻到哪去了? 正在遐想中, 忽然, 我听到从西端凯旋门那头, 一阵热烈的掌声如浪潮般向东涌来。这时, 原本静静地站在我边上的两位法国老太太, 也激动地一边向前挤, 一边高举双手, 用法语高呼着: “谢谢! 谢谢!” 怎么回事? 我赶紧用劲踮起脚尖, 这才发现, 原来是一个红色的消防车方阵正向东驶来。正是他们的到来, 引起了一片欢呼。第二天我才知道, 今年法国的阅兵仪式上, 特地邀请了参加过纽约9·11救援的一辆消防车, 还有四位来自纽约消防队的英雄。显然, 法国人, 当然还有众多的游客们, 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掌声、他们的敬意献给了消防队。此事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 为什么法国人将他们的欢呼和感谢献给了消防队而不是法国自己的军队呢? 或许, 从这件小事里, 也折射出了9·11事件在人们内心深处造成的影响。法国社会民众中的人权、反战意识一直很强, 9·11事件之后, 人们痛恨恐怖事件, 从内心深处感到恐惧, 但与此同时, 大多数人也反对以暴制暴的行为。他们不自觉地希望寻求安全祥和的绿洲, 寻求和平的守护神。那么谁能保护我们呢? 是装甲兵吗? 是新

[收稿日期] 本文根据作者2002年10月14日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上的发言稿整理。

[作者简介] 李明欢, 女, 博士,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从事国际移民学及华侨华人研究。

式战车吗？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吗？这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思考。

9.11事件对欧洲社会政策也产生了一连串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走向之一就是极右势力抬头，右翼在民众中得到的支持率明显上升。大家可能还记得，1999年奥地利极右势力自由党上台，该党首脑人物带有法西斯色彩的言论，遭到朝野共同谴责，而且还曾经引发欧盟对奥地利的联合制裁。可是，从世纪之交到今年年初，却出现了欧洲极右或右派势力在一系列大选中，“连下八国”，也就是连续在西欧八个国家大选中获得胜利。法国是人权宣言的诞生地，一向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可是，就在今年初法国的大选中，极右派勒庞却在第一轮大选中“意外”胜出，此事可以说震惊了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当然，此事发生后，法国左派立刻行动起来，法国的民众也被动员起来，在第二轮大选前，法国举行了多次反对极右势力的大规模群众游行。尽管极右派勒庞在法国第二轮大选中失败了，但因为第二轮选举是在极右和右派之间选择，因此，法国政坛还是出现了右派掌权的局面。

欧洲极右势力的兴起给人们带来深深的不安。如何认识欧洲极右势力抬头的原因及其与移民问题的关系？欧洲政局的变动对外国移民生活是否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移民在当今欧洲的现实生存环境如何？可以说，在法国的那几个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口曾经长年大批向外迁移。但是二战以后，却出现了大量外国移民不断涌入欧洲的现象。大概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欧洲人对外来移民基本上比较宽容，种族歧视论调遭人唾弃。但是，9.11事件却使人们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异民族移民，产生了警觉、甚至是排斥的心理。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朝野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移民政策也是国家社会政策中的一大症结。那么，有些什么社会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是语言解禁现象，一些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论调的极右言论在不知不觉中被解禁。大家知道，9.11之后，在“国家安全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下，外来移民成为主体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移民尤其是具有某种宗教背景的移民受到了排斥。在欧洲，战后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带有种族歧视或宗教偏见的论调在媒体或公众场合都是不允许出现的。但9.11之后却改变了。这显然同美国的反恐宣传有关。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就有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移民，美国的民众很受震动：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中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会对这个国家如此仇恨呢？这些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的福利，却反对我们，危害我们，因此应当赶走他们。在这种情绪主导下，赶走移民的舆论升级了，而且被不少人默认了，接受了。因为这些在“国家利益”口号下出现的反移民论调，很容易得到国民的支持。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零宽容政策”。英国首相布莱尔就说过：我们“必须与原谅文化决裂”。有舆论认为，我们同情外来移民，原谅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念不相符合的行为，我们让他们分享我们的福利，结果呢，他们却反对我们。与“零宽容政策”相连的就是“零移民政策”，就是排斥移民，反对移民。我们知道，欧洲很多国家都是福利国家，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福利，只有自己国家的公民才应享有。德国右翼在竞选纲领中就提出：“最近几年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在享受着我们的福利制度，而不是进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不应该让移民分享本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和福利。由于这种舆论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当然也就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中引起了共鸣。

第三个口号是所谓“捍卫传统价值”。这一口号说穿了就是认为欧洲应当是欧洲人的欧洲，欧洲文化的欧洲。那么，谁是欧洲人？什么是欧洲文化呢？在那些人看来，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等欧洲主体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理应受到捍卫。这一口号与“多元文化”的理念是相对立的。有舆论认为，多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失败的，而且后患无穷。政府的政策不仅不是促进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主流文化，而是为移民提供帮助，

让他们建自己的教堂，成立自己的社团，再来反对我们。有一些极端的观点甚至提出：在欧洲应当奉行“种族一致”原则。他们认为，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全，就要种族一致，只有这样，本国国民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由此，有舆论还公开提出应当全面实行“国民优先”。有文章公开提出，现在是“外国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今后在就业方面，在一个法国人与一个外国合法移民之间，应当优先雇佣法国人；在社会福利方面，法国人应当比外国合法移民有优先享受权，这才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做法。这些说法在民众特别是普通工薪阶层中得到普遍支持。右派的这些口号和政策得到了响应，它的得票率也相应上升。

当今的许多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些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最强烈地感受到新经济浪潮和外来移民威胁的恰恰是普通的工人群众。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便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向第三世界转移，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相继涌入，为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提供一批批低廉劳动力，就业市场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还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大量输入发达国家，在欧洲，常常可以看到商品上写着“Made in China”、“Made in Taiwan”，还有“韩国造”，“马来西亚造”，“泰国造”，等等，这些商品也对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冲击。总之，全球化、移民潮带来的这些变化，使发达国家的蓝领阶层面对新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右派团体就出面组织工人反对外来移民，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把工作机会让给外民族的人？应该让我们自己的国民去做。”欧洲一位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曾明确指出：“欧洲的难题是：市场需要移民，但人民不想要他们。”

知识界的状况相对较具理性。我在法国期间，对于欧洲进步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独立的批判精神，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参加过多次关于国际移民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我注意到，不少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近来频频出现的反移民论调，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要知道，在9.11之后的特别时期，公开坚持自己的人文理念是需要特殊的勇气和胆识的。9.11之后，美国出现了空前强烈的爱国热潮。据说在美国，9.11事件之后一周内，全国大小商场商店的国旗销售一空，每幢建筑、每辆汽车上都插着美国国旗，不插国旗就是不爱国，开车上街都可能麻烦。总统布什的对外政策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谁敢反对布什的政策？谁敢批评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美国应当对自身对外政策做些反思的言论，都可能被指斥为是对美国利益的背叛，敢于公开发表此类言论者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有人说：麦卡锡时代又回来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仍然有学者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对以暴易暴，反对种族一致的论调，强调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谐。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公开声明：反对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人不是都被列上了黑名单吗？那么，请加上我们的名字吧！我们将为此而感到自豪。这种坚持正义的精神令人钦佩。

除了工农民众和知识界外，还值得注意的就是资本的力量。这是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得益最多的势力。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廉价的移民劳动力，追求更自由的资本市场，推进生产要素能在国际间更自由地流动。他们希望移民政策能够更灵活，从而形成影响移民政策的一股力量。全球化首先是经济进程。跨国贸易、人口流动对发达国家的高工资经济形成强烈冲击。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面对新的严峻的挑战，促使经济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这已是众目共睹的事实。谈到移民政策，必然涉及人口构成状况。那么，就总体而言，目前欧洲的人口结构如何？对移民的实际需求如何呢？

根据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在2000年初的一项报告，从2000年到2025年期间，仅为弥补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间的比例关系，欧洲就可能需要引入将近1亿5千9百万移民。法国的情况，如果只是为了维持目前的人口总数，50年内大约需要147万移民。如果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每4.1个就业者养活1个65岁以上的退休者，那么，法国需要吸收9370万人，大约每年170万人，否则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4岁。在德国，由于在计算

机信息产业及餐饮旅馆业等领域劳动力缺乏，需要依照“德国的利益”制订切实可行的移民政策，因此，大约在2010年左右，德国可能正式推行移民积分制，主要参数将包括投资方最关注的年龄、学历、技能、经验等等。我们常戏称爱尔兰是欧洲的大农村，目前欧洲国家的留学签证属爱尔兰最容易，因为该国正考虑在未来七年内输入20万外国合格的劳动力。

我们再看华侨华人在欧洲的境况如何。中国移民欧洲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影响也在不断提高。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华侨华人总数在战后初期的50年代，大概只有一万多人，到了20世纪末，则猛增到上百万人，增长百倍以上，这还不包括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新移民。因此，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我在最近出版的《欧洲华侨华人史》一书中，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研究欧洲华侨华人历史的心得，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今天我重点谈一谈欧洲华人社会近期的一些新变化。

前面我已经谈到了9.11事件之后欧洲移民政策的变化，那么，这样一种新形势对中国移民的影响如何呢？可以说，影响是相当微妙的。从总体看，虽然外来移民承受的压力明显增大，但中国移民的生存状态反而相对宽松。为什么？我分析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政治上，中国本身国际地位提高，尤其在9.11之后，中国政府明确坚持反恐立场，在欧美国家产生直接效应。我在和欧洲学者讨论时，不少人都明确提到，欧洲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中国移民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投鼠忌器。他们担心如果一味严厉排斥中国移民，万一激怒了中国政府，就少了一支极为重要的反恐力量，还会失去可能在中国大市场中占有的份额。

其二，中国移民大都没有宗教背景。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功利，非常实用的，所谓“见佛就烧香，见神就叩头”。好些中国新移民到了欧洲之后，就开始信仰当地流行的基督教、天主教，到当地教堂做礼拜，接受当地教会提供的各种资助，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活动。好些人其实并不一定真的理解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义，好些连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分别都搞不清楚，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对我的生存状态有帮助就行。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移民不太可能依靠某一宗教形成与当地主体国家相对抗的社会力量。

其三，前面我说过，好些欧洲当地人说，我们需要的是劳动力，结果来的却是分享我们福利的人。就此而言，中国移民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移民明显不同。有欧洲学者专门就此问题做了研究，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好些国家的移民是冲着享受欧洲的高福利而去的，到欧洲后并不想工作，不好好干活。但中国人则不同。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第一代中国移民普遍有拼搏精神，有创业精神，他们到欧洲是为了打工，为了挣钱，他们要发财，当老板，衣锦还乡。中国人自己说：“我们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天。”欧洲人形容中国人拼命工作的精神：“如果一个星期有八天的话，那些中国人绝不会只干七天。”总之，中国人是以他们的吃苦耐劳，超时超量工作，在为自己争取特殊的生存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谈，欧洲的移民政策本身也存在诸多矛盾，因为它一方面排斥移民，一方面又需要移民。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欧洲国家都相继实施过大赦政策，西欧国家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都实施过大赦。大赦政策使得那些非法的、无证的移民有一个转变身份的机会。非法移民一旦遇到大赦，符合大赦的条件，就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合法公民。很多人由此一夜之间从地下了到了地上，从黑暗转到了光明。在大赦政策方面，中国移民也显示出某种优势。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络，比如，大赦时有一定要求，要求申请人“已在当地居住多少多少年”，或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超过多少年”等，中国人往往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需要什么证明，他们就能够提供什么证明，很多人都是通过此类途径转换了身份。我有一次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一个学术讲座，我谈的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如今移民身份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有合法入境，非法滞留；有非法入境，合法居留；还有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一旦遇到大赦，遇到“合法化运动”，那么，不合法立刻转变为合法，那些违法的过

去，一笔勾销。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探讨过“偷渡”或“非法移民”意识在中国某些地区滋生、泛滥的问题。^①我认为，除了那些地区的社会氛围、群体观念、民间网络等因素外，西方移民政策的潜功能，同样为偷渡潮推波助澜。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国门初开之时，中国人既不懂、也不敢以身试法搞什么偷渡。最初的“违法行为”，只限于申请一个短期的探亲签证，入境后先打工赚钱再说。正当在西欧的“逾期居留者”与日俱增而人心惶惶时，忽然，1981年，法国政府的一纸大赦令，使十多万“非法偷渡客”摇身一变成了“法国人”。如此消息一传回移民者的家乡，真有如平地春雷，闻者“茅塞顿开”：现如今竟然还可以有这么一条出国之道！随着西方国家一桩桩“大赦新闻”在侨乡不胫而走，在乡里民间的议论中，“偷渡”根本就不是什么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而只不过是缺乏先赋条件的移民靠自身“奋斗”及“运气”而选择的出国途径，只要获得“成功”，就是一段可以炫耀的经历。偷渡意识急剧泛滥。在西欧各国，积聚起了越来越多等待“身份合法化”的中国人，而当前一批人“拿到身份”后，更多的后续者又闻讯而至。中国移民有自己的期待，面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的期待有了某种合理性，因此，他们愿意忍受苦难和艰辛，等待着从黑到白，从鬼到人的转变机会。

中国新移民已经成为倍受欧美各国政界、学界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21世纪是移民的世纪。世界范围内人口的跨境流动，规模相当可观。虽然在世界移民潮中，中国移民的绝对数量从比例上来说，还是相当有限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它可能具有的潜在移民数量一直令人关注。西方一位学者就著文指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发展，势必进一步打开中国人口向外流动的大门。然而，假如中国的改革出现后退，则可能引发巨大的难民潮。言下之意，当代中国人大量跨境流动的趋势无法避免。

今年夏天在法国期间，我搜集了一批中国新移民的数据。我从粗略的统计中发现，1998年以来进入法国的中国新移民，虽然仍以浙江人为主体的，即浙江人大约占移民总量的60%左右，但其余人口从地域上说，来自全中国除青海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除浙江外，新移民人数最多的头十个省市自治区依次为：福建、辽宁、上海、山东、天津、吉林、黑龙江、广西、江苏、广东。移民潮席卷的地域、人群范围明显拓展，值得注意，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据我所知，目前在欧洲多所大学，都有学者在从事关于中国移民的专项研究。由英国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两位学者共同主编的《欧洲华侨华人》一书已经出版。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有一个关于跨国族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的大型研究课题，其中的一个子课题是“跨国迁移的福建人”。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法国的巴黎第七大学，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都有我认识的学者在从事关于当代欧洲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也将欧洲中国移民问题列为其研究要点之一。

当今，信息、资金、商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空前活跃，势必带来人口的相应流动，因此，应当认真追踪剖析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演变，疏通人口流动的正常渠道，规范合法化的移民操作，积极顺应全球化形势下国际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我想，不管今后移民状况、移民政策怎么发展，中国移民问题总是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作为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应当从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组成部分的基点出发，结合中国移民的特点加入国际移民研究对话，增进国际移民学界对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关注，回应国际上某些人在中国移民问题上带有攻击性的偏见与挑衅，这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职责。

谢谢大家！

^① 请参阅拙文《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载《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05—11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复印资料《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2期全文收录。